

“研究军事、研究战争、研究打仗”专论

叙事较量：“后真相时代”的认知战

■毛炜豪 章东阳

所谓“后真相时代”，就是人们把情绪放在真相之前，由情绪来引导认知的时代。现代社会里，获得一点真相是容易的，困难的是获取全部真相。当真相不完整时，人们的认知就很容易被误导。于是，围绕“叙事”的较量成为认知域战场的重要阵地。“同一个事实，不同的表述”，成为认知战的重要表现。

要点提示

- 如果说传统战争中的枪炮是为了消灭敌人的肉体，那么认知战中的叙事就是为了改变人们的思想。
●认知域中，语言、文字、声音、图像等一切信息的载体，在精心编织的叙事结构下，都可能成为“射向思想的炮弹”，达成常规手段难以企及的效果。
●现代社会，围绕“叙事”的较量成为认知域战场的重要阵地。“同一个事实，不同的表述”，成为认知战的重要表现。

关于“竞争性真相”

英国学者赫克托·麦克唐纳在《后真相时代》一书中提出一个概念，叫作“竞争性真相”，意思是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描述同一件事物，这些描述具有同等的真实性，但只包含片面的真相。比如下面两句话：互联网拓宽了全球知识的传播范围；互联网加速了错误信息和仇恨的传播。如果只听第一句，人们会认为应该大力推广互联网；如果只听第二句，人们会认为应该对互联网严加管制。其实这两句话都是真相，而“竞争性真相”只告诉我们其中的一面。

为什么不知告知全部的真相？因为对方想影响我们的认知。在“9·11”事件一周年的讲话中，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告诉美国民众四个事实：第一，伊拉克仍然在资助恐怖活动；第二，伊拉克跟基地组织有一个共同的敌人，那就是美国；第三，伊拉克跟基地组织的高层有长达10年的联系；第四，伊拉克曾经培训过基地组织的成员，教会他们制造炸弹等致命武器。

听完小布什说的四个事实，人们会觉得伊拉克可能跟“9·11”事件有关，或者说伊拉克可能也在策划袭击美国。

实际上，小布什说的四个事实都是真的，但是他没说“伊拉克袭击了美国”——那是受众自己脑中形成的推论结果。还有一些真相小布什没说，那就是：第一，跟基地组织存在联系的国家或地区还有很多；第二，美国也曾对基地组织提供过培训和资助；第三，敌视美国的国家不少，他们似乎都可以被视为“与基地组织有共同的敌人”；第四，最重要的是，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伊拉克参与了“9·11”事件。

在信息泛滥的时代，某些情况下，截取的真相会像谎言一样误导人，甚至比谎言更容易误导人。“真相像散落无数碎片的镜子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

一小片是完整的真相。”“后真相时代”的认知战，就是通过讲述“竞争性真相”，来改变作战对象和相关民众的认知，从而隐秘地达成或辅助达成战争目的。

叙事的三个策略

如果说传统战争中的枪炮是为了消灭敌人的肉体，那么认知战中的叙事就是为了改变人们的思想。认知域中，语言、文字、声音、图像等一切信息的载体，在精心编织的叙事结构下，都可能成为“射向思想的炮弹”，达成常规手段难以企及的效果，如煽动民众情绪、激励本国士兵、瓦解敌军斗志，甚至鼓动“颜色革命”等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叙事的对象未必是敌人，也可能是本国民众和士兵。只要能达到“强化自身”“削弱敌人”的目的，此类叙事都可纳入认知战的范畴。

那么，作为指挥员，应该如何讲述“竞争性真相”？最常用的有三个策略。

第一个策略是背景衬托。清朝咸丰年间，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，由于经验不足，初期总是战败，其起草的一份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上写道“屡战屡败”。曾国藩的幕僚一看，把这四个字调整了顺序，改为“屡败屡战”。咸丰帝看后不仅没生气，还褒奖了湘军的勇武精神。这两种表述说的是同一个事实，都说总打败仗，但性质不同。前者说明能力不行，后者强调精神可嘉。二者在策略层面的差异在于，“屡战屡败”的表述，“屡战”是背景，“屡败”是结果；而“屡败屡战”的表述，“屡败”是背景，“屡战”是结果。大脑的认知特点决定了我们总是关注结果而忽略背景。这四个字的顺序调整看似简单，却将表述主体和参照物颠倒过来，产生了完全相反的叙事效果。

第二个策略是提供数字。人的大

脑往往更容易接受数字信息。一旦有了数据上的支撑，叙事内容就会看起来更真实可信。例如，在美国对西班牙的美西战争中，美国海军的死亡率为0.9%，而同期纽约市民的死亡率为1.6%，因此这个数据被美国海军引用作为征兵广告，以此证明去美国海军当兵甚至比坐在家更安全。事实上，这个对比极具误导性：能入伍的都是身体健康的成年男性，而纽约市的全体居民则包含老幼病残。

第三个策略是问题定性。所谓定性，就是一种价值判断。通常而言，符合人们价值观的观念或行为会被接受，反之则被排斥。给问题定性，是认知域非常重要的一种策略，因为它将决定人们后续的想法和行为。例如，甲午战争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侵略战争，但日本将其定义为“文明之战、解放之战、救亡之战”；所谓文明之战，是“先进文明战胜落后文明”；解放之战，是将中国人从“满清夷狄”治下“解放”出来；救亡之战，则是通过征服改造，“团结”黄种人对付西方白种人。日本一边处心积虑地为战争定性，一边积极公关甚至收买西方媒体和记者。在其舆论宣传下，甲午战争从一场侵略战争，被美化成“中国的战败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、专制和独裁中得到解放”。其结果是，当时绝大多数西方主流媒体都对对中国没有同情，甚至一些看法认为，日本打败中国是“文明对野蛮的胜利”，是“进步对保守的胜利”，是“人类文明的一次进步”。

如何应对“后真相时代”

在充满“真相碎片”的时代，面对敌人处心积虑的叙事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

恪守逻辑。只遵循客观缜密的逻辑

推理，而不为主观情绪所掌控。面对敌人提供的信息，首先在头脑中画一张“信息拼图”，看看对方给的事实是否足以推导出他想要的结论。如果缺少关键事实，想想对方为什么不说不说。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前，美国情报机构人士向媒体“泄露”了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“确凿证据”，媒体随即大肆渲染该地区面临的安全威胁，成功煽动民众的恐惧情绪。如果对所谓的“确凿证据”进行分析，会发现不过是：第一，萨达姆政权控制着拥有发展核武器技术的科学家；第二，根据未经证实的情报，伊拉克试图从尼日尔、索马里购买铀；第三，一旦获得充足的武器级裂变材料，伊拉克可能在数月甚至一年时间内制造核武器。这些“证据”是部分真相与主观猜测的混杂，足以令人产生“伊拉克正在制造核武器”的印象。但如果缜密分析后，会发现这些所谓的“证据”根本不足以得出“萨达姆政权拥有或即将拥有核武器”的结论。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发布关键性证据？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此类证据。撒谎的成本很高，被发现后会严重影响国家信用，而讲述“竞争性真相”则成本很低，但已经足以达成目的——煽动民众情绪，为美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提供借口。

追溯动机。顺着对方提供的事实，思考其可能采取的行动；通过比较“可能结果”与“实际结果”之间的差异，追溯和洞察对方的原始动机。1967年6月5日，以色列先发制人，出动空军摧毁了约400架埃及、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飞机，确保以色列地面部队在随后的六日战争中取得优势，最后控制了西奈半岛、加沙地带等许多地区。战后，以色列为自己辩护的说法是，埃及即将对

“认知域作战”纵横谈

观点争鸣

反无人机“蜂群”作战，是当前世界各国军队关注的重点。外军模拟试验表明，采用传统侦察探测手段和现有防空系统应对无人机“蜂群”攻击时，往往会陷入“看不清、打不完、耗不起”的被动局面。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，人们通常将“蜂群”看成大量的无人机个体进行拦截，很容易顾此失彼、防不胜防。因此，在反无人机“蜂群”作战时，应借鉴传统的整体观思想，将“蜂群”看作是一个有机统一体，从事物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角度考察，研究反制策略和防抗方式。

树立整体防抗观，首先应跳出同时逐个拦截单个无人机的局部对抗模式，将“蜂群”看成是由大量不同类型无人机构成的有机整体，并考虑其与其他作战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，从全局上选择最佳作战方案，实施整体对抗。在组织筹划上，将反无人机“蜂群”作战融入联合作战行动，通过其他作战行动的支援配合，为反“蜂群”作战创造有利条件。比如，在联合夺权瘫痪作战时，一并将无人机“蜂群”的后方控制单元、数据通信链路、导航定位等保障系统纳入打击、毁瘫范围，借助联合作战行动从总体上破坏“蜂群”的规划控制、行动支撑及与其他作战单元的协同配合能力，将整个“蜂群”孤立起来。在攻击重点上，突出对“蜂群”无人机的运输平台、指挥控制和通信网络等关键支撑系统进行干扰、压制和破坏，造成整体性失效。比如，“蜂群”无人机由于机动距离、续航能力有

从整体上防抗无人机“蜂群”

■赵先刚 王鑫

以发动攻击，以军的行动只是“防御性自卫”而非“进攻性侵略”。据相关调查，埃及确实计划于5月27日进攻以色列，代号为“黎明”，但这项计划最后被埃及总统纳赛尔取消。尽管以色列的说法遭到国际舆论的质疑，但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军的进攻行动提供了法理依据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师出有名”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以色列宣称他们将会遭到攻击未必是说谎，但暗示这种攻击很快会发生则是一种巨大的误导。人们有理由相信，对“防御性自卫”的叙事，作为一种认知战行动，本身可能也是“六日战争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埃及被取消的进攻计划，则为以色列发动战争提供了绝佳借口。

还原真相。归根结底，更具代表性、更加全面的真相是对抗误导性真相的最佳武器。2016年8月，叙利亚民防组织（俗称“白头盔”）发布了一张照片：一个名叫奥姆兰的小男孩坐在救护车里，头发蓬乱、衣衫褴褛、赤着双脚、身有血迹。配图文字称，奥姆兰刚刚被“白头盔”从一场由叙利亚政府制造的炸弹袭击中救出。这张令人心碎的照片登上了许多西方媒体的版面，在广泛引发同情心的同时，激起了国际社会对叙利亚政府的强烈谴责。最终，奥姆兰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揭露，爆炸发生后，一群人将奥姆兰从他手里抢走，然后拍摄了那张照片，“唯一的目的是向西方媒体消费我们”“至于那场突发事件是谁造成的，至今都没有结论”。随着越来越多的真相被揭露，“代表正义与希望”的“白头盔”组织，逐渐被证实是西方舆论战的马前卒，通过“摆拍”“暗示”“误导”甚至直接造假，制造各种矛盾焦点，并把矛头指向叙政府，帮助反对派在舆论上造势。随着真相被还原，“白头盔”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，变成了一个自导自演的“小丑”组织。

事实决定观点，观点决定行动。从更深层次解读，也许事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“事实带给我们的感觉”，而感觉才是绝大多数人行事的主要依据。其启示在于，面对敌人的“叙事”，不要轻易被情绪裹挟，要尝试用理性和逻辑破解真相，洞察对方的动机，并用“反叙事”的手段反击，才能在这场“后真相时代”的认知战中立于不败之地。

练就一眼窥透要害的本事

■张西成

挑灯看剑

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里有一个情节：退休船长彼得·加里，被人用鱼叉钉在木板上离奇身亡。警探在现场找到一个笔记本，他认为顺着这条线索就能抓住凶手。而福尔摩斯注意的是使用鱼叉的技巧、惊人的力量以及装着烟丝的海豹皮烟袋，断定作案人员很可能是

一个捕过鲸鱼并且身强力大的海员，进而使用计谋使其自投罗网。

小说毕竟是小说。不过，它却能给人以启示。当同行还坠在五里云雾时，福尔摩斯每每已将无头案揭开。他的高明之处，就在于能够透过扑朔迷离的现象，一眼看出案情中最关键的环节。这种本事，正是我们指挥员所需要的素养。

战争历来是智与谋的较量、生与死的比拼，敌对双方无不极尽隐真示假之能事。在针锋相对、犬牙交错的战场上，指挥员接收到的信息常常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不确定性：是事物本真的常态，还是被扭曲了的异态？是敌人有意设置的圈套，还是因疏忽而露出的破绽？是无关紧要的细节，还是举足轻重的关节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指挥员若没有超常的透视要害、抓住本质的本事，就难以走出云迷雾绕的迷宮。

战争中靠敏锐直觉洞察敌人企图的事例不胜枚举。公元前615年，秦军派使者到晋晋约定次日会战，谋士史丹派通过仔细观察，发现秦军使者说话时眼睛乱动并声调失常，便断定秦军畏怯，可能要趁夜退却。三国后期，吴国建平太守孙彦发现从长江上游漂来很多竹片木屑，便断定西晋在上游大造舟楫准备伐吴。在我军战史上，也不乏这样优秀的指挥员：有的通过翻阅从敌占区带来的报纸，准确判断出敌人的军情动向；有的观察敌人炮火射击的弹着点情况，准确判断出敌人的进退止。这种一眼看破、一叶知秋的能力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是优秀指挥员不可或缺的本事。

应当看到，现代战争已进入发现即摧毁的“秒杀”时代，胜负转换往往就在毫厘之间，客观上更加需要我们不断强化读秒意识，善于在扑朔迷离的战局中，一瞬间看透敌人的企图与伎俩，一击而取胜。如果各级指挥员没有这种意识和本领，仍沿袭过去那种凡事必先分析论证、逻辑推理一番的习惯，其结果很可能是“当你完全地、清晰地触摸到战争的本质时，你可能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”。

把握好“本手、妙手、俗手”之变

——从棋理中感悟胜战机理

■胡建新

群策集

2022年全国高考1卷，以围棋中的三个术语“本手、妙手、俗手”命题作文，再次成为一年一度媒体关注和民众议论的热点。围棋是博弈的起源，战争则始终充满着博弈，因而下棋与打仗有相通之处，棋理与战争制胜机理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围棋中的本手是指合乎棋理的正规下法，妙手是指出人意料的精神妙下法，俗手是指貌似合理却很可能受损害的下法。学习下棋，当然要从本手开始，掌握基本章法、主要技法和一般下法，再融会贯通、渐出妙手。当棋手知识和经验储备不足、计算和算计能力欠缺时，难免会出俗手。在势均力敌的棋局中，本手虽然不会让自己迅速获得优势和胜利，却可以让自己站稳脚跟，为胜利夯实基础。企图走捷径、妄想出手即妙手，不仅会欲速不达，而且可能误入歧途、满盘皆输。

就战争基本法则而言，许多“本手”是无法规避和难以超越的。如进攻，需要集中兵力火力，主攻一部，助攻其他；如防守，需要凭借坚固工事，避敌锋芒，以守待变，等等。作战过程中，正常用兵是按一般用兵法则行事，可谓“本手”；反常用兵则是建立在正常用兵基础之上的特殊用兵，可谓“妙手”，它勇于打破常规，善于使用各种非常手段，令对方按照常规用兵思维

造成判断失误，从而出其不意地战胜对方。欲打胜仗，必先熟悉基本的军事知识、战争形态及其特点规律，掌握基本的战争规则、战术原则和战法运用，在此基础上再随机应变、运筹决胜。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，任何对手都是诡计多端、异常狡猾的。要想克敌制胜，就要既懂得“本手”，掌握正常常规的用兵之法；又熟谙“妙手”，善用反常的用兵之术。这样，无论敌人摆出什么阵势、使用什么战法，都能从容应对、措置裕如。

战争中能下出“妙手”固然不易，但能下好“本手”也很不简单。很多情况下，“本手”也是可以战胜“妙手”的，而“俗手”则可能因为过于“愚拙”反会让对方作出错判后浑然不知、误入彀中。强调出奇制胜，就不能只讲“妙手”、不讲“本手”，只知道用奇、不知用正，而应当本手相辅、奇正相生。正如孙子所说：“无穷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”，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。不难理解，“本手”的娴熟运用可以升华为“妙手”，“俗手”的反常运用也可以转变为“本手”和“妙手”。有些时候，失去“本手”的支撑，不但难成“妙手”，反而会成“俗手”；“妙手”用得多了，往往会成“俗手”甚至“臭手”。这其中的关键，在于恰到好处地把握本妙之变、奇正之变、新旧之变。科索沃战争中，面对美军F-117A隐身战机骄横无敌地出动与空袭，南联盟军队通过最普通的“本手”——通信窃密法，获取了该战机的飞行路线与出动规律，进而捕捉并将其击落，打破了美军之“妙手”——

F-117A战机不可战胜的神话；而击落F-117A战机的萨姆-3导弹，尽管北约事先掌握了它的阵地位置，南联盟却依然采用极其普通的“本手”——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成功地避开了北约之“妙手”——高技术武器的空中打击。

“本手”与“妙手”、正常用兵与反常用兵，都必须因时因地因敌因势制宜，把握用兵用计时机，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、地点、时间、环境等，经过科学周密的分析来实施，切不可脱离实际盲目行动，也不可将彼时彼地的精妙战法机械地照搬到此时此地来运用。如果在不同条件下生搬硬套一种战法，必然会破绽百出、弄巧成拙。须知，“本手、妙手、俗手”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，当重复用兵成为兵家大忌、人人不屑为之的时候，偶尔恰当运用，则可能成为“妙手”；当反常用兵成为奇招而屡试不爽的时候，如果一再效仿，就可能成为“俗手”。“空城计”可谓“妙手”，但若不顾实际一味使用，很容易成为被对方一识就破的“俗手”和“臭手”；增兵增灶、减兵减灶，这是合乎常规的“本手”，但若视情反其道而行之，则可能成为出人意料的“妙手”。

在充满盖然性的未来战场上，无论战争形态出现怎样的变化，高新技术武器有着怎样的神奇，都需要指挥员有胆有识、有智有谋，做到既懂“本手”、也懂“妙手”，既知用奇、也知用正，既能运用高科技、也会使用“土办法”。举凡一切克敌制胜之术，指挥员都应不拘一格、灵活运用。

限，通常以大型机动平台为“母舰”进行远程投送及防区外的规划控制，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并准确识别无人机“母舰”，进行抢先攻击，可毁“蜂”于“巢”，实现源头上的整体歼灭。在手段运用上，注重多种反制手段和先进技术的相互配合，综合施策、联动作战，通过作战效能叠加互补，达成对无人机“蜂群”的整体防抗。比如，可将网电“软”攻击方式与全方位、多类型的“硬”摧毁手段合理搭配使用，相互协同对无人机“蜂群”实施多重复合打击，从而极大地提高整体拦截打击效果。2019年，外军曾组织定向能武器反无人机“蜂群”系列试验，在其他作战系统的支持下，综合运用5种激光武器与高功率微波武器，能够实现对80架无人机的全部成功拦截，单次最大拦截量达到20架。

同时，从整体与部分辩证统一的角度看，如果“蜂群”的整体性遭到破坏甚至完全被打乱成零星的无人机个体，将同样可以降低或消除“蜂群”作战效果。因此，树立整体防抗观，还应从降低无人机“蜂群”优势发挥的角度，通过多种战术或技术手段综合运用，打乱其协同的整体性，破坏其行动的有序性，使“蜂群”变成能力有限、互不关联的个体，致其无法在局部的时间和空间上形成数量规模优势，为分区、分层、分类进行有效拦截、抗击创造条件，进而达到整体反制的目的。比如，通过电子干扰压制“蜂群”无人机的导航定位和群内通信，可有效降低定位精度，造成航线偏离和行动失序、失控；或借助假目标欺骗掩护，对作战力量进行广域、分布式部署，迫使“蜂群”分散而降低作战效能；或采取“以多制多”模式，使用优势“蜂群”穿插、袭扰，通过撞击等方式破坏来袭“蜂群”队形，甚至还可进行分割、围歼，彻底解决“蜂群”威胁。